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一二·九运动

孙钢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一二九运动

孙钢 编写

目 录

一、民族存亡的关头	1
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8
三、全民族抗日救国的大风暴	18
四、踏上与工农相结合的征程	24
五、历史的回声	30

一、民族存亡的关头

华北告急 危在旦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突然袭击方式，在沈阳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开始了它蓄谋以久的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侵略战争。对此，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使得仅在两三月内，东北三省沦于敌手。祖国的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肥沃领土，4000余公里铁路，丰富的资源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囊中之物。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1932年1月28日，日寇挑起“淞沪战争”，进攻上海，直逼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度迁都洛阳。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初攻陷热河省省会承德。5月下旬，日军突破长城各口，长驱直进，北平、天津陷于日军包围之中，富饶的华北平原，成了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的一块肥肉。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非但不下令抵抗，反而在1934年5月31日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划出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进入的“非武装区”，这就给日军侵占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日本继续加紧侵占华北的步骤，提出所谓使华北“特殊化”的《日本政府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目的是实施

所谓“华北自治”，建立汉奸傀儡政权。5月，日军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非武装区”，违犯了《塘沽协定》，一面调遣东北日军进关，一面向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提出多种无理要求。在日方的政治恫吓和军事要挟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屈服了。6月4日，国民党政府派其驻华北代表、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9日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同月27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与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三团；从所谓“满洲国”国境附近，撤走二十九军；撤换河北省主席、北平和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同时禁止全国的反日活动，等等。至此，国民党政府已将华北冀察两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拱手交给了日本侵略军。10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粉墨登场，在距北平仅20公里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殖民地。不仅如此，蒋介石竟于11月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以满足日本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第2个“满洲国”的命运已经摆在华北面前，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

蒋介石对日寇妥协退让，而对抗日民主运动则恨之入骨，大肆镇压。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发表杂文《闲话皇帝》，国民党政府以妨碍“中日邦交”的罪名，封闭了该周

刊，并将该刊主编杜重远逮捕判刑。国民党政府还颁布了《邦交敦睦令》，声明要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行和反日的团体。不久，东北大学由高崇民、阎宝航等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遭到取缔，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也相继被迫解散。报刊上的“抗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转而出“抗×”和“××帝国主义”所取代。

此时的平津两市，已经呈现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坦克在天津大街上横冲直撞；日本特务随意冲入中国大学课堂；日本驻华使馆“邀请”北大校长蒋梦麟谈话，一去三小时方准告退；北平前门火车站，大批的故宫古董装箱南运，政府要员携带金银细软和家眷纷纷出逃；东北大学欲迁西安，清华大学即迁长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险恶的形势冲撞着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具有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的北平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目睹险象环生，一触即发的华北局势，忧心如焚，他们时刻悬念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借最流行的救亡歌曲《毕业歌》来抒发自己的郁闷：“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学生，包括燕京大学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东北大学

的宋黎等，经常到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家里聚会，他们从斯诺那里得到一些被国民党当局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了解时局的发展变化，比如华北“特殊化”、土肥原的频繁活动、宋哲元的暧昧态度，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等等。在斯诺的支持下，黄华、陈翰伯等人用英文给孙夫人宋庆龄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苦闷的心情，这封信由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捎去，十几天后，他们接到了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回信。信中指出处于北国抗日前线的青年学生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局，“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孙夫人的来信，道出了进步学生的心声，严酷的现实，一再告诉他们：除了反抗，再没有别的出路。

1935年11月1日，以清华、燕大、师大等为首的平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写道：国民党政府“莫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自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失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藉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宣言》吁请国民党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诚以国势如斯，凡

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存。”这个《宣言》是爱国青年学生公开讨伐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战斗檄文，为争取抗日救国自由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它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抗日学潮 一触即发 国土不断沦丧，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使一切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庄严发表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救国抗日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各个政治集团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集中地表达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愿望和意志，字字句句拨动着华北青年学生的心弦。《八一宣言》经过各种渠道辗转流传到平津各校，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情绪受到巨大鼓舞，成为他们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由王学明担任书记，成员有彭涛、冷楚等。北平工委成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挑起了领导北平人民，尤其是爱国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重任。北平工委首先抓了发展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在一些大、中学校建立了武装自卫会小组，团结了一批

爱国进步学生，并在其中发展了一些党员。1935年7月，华北山东一带发生黄河大水灾，平津两地到处皆是逃难的灾民。中共北平工委按照上级指示，着手组织学生开展水灾赈济活动，以便掩护党的革命活动。8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在西山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会上推选了吴闰箴为临时主席，姚依林为记录。会后到北平社会局备案，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对外公开活动。10月，在赈灾活动结束后，党不失时机地将水灾赈济会组织转变为北平学生联合会。11月18日，召开了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选举了北平学联的领导机构：主席：郭明秋（女一中），秘书长：姚依林（清华大学），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交际：黄华（燕京大学）。学联党团负责人为彭涛，由李常青直接领导。

北平学联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场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即将兴起。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市立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个决议案。同日，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决议案。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北平各校通电》。《通电》在痛陈了自“华北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后，尖锐指出：“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通电》请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宣布对日外交政策，动员全国

对敌抗战，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

就在这时，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华北特殊化”的消息，这使每一个爱国者都感到震惊：华北各省又将继东北四省之后落入日寇之手，华北实际上已是名实俱亡了。这个消息，犹如一个火星落到了布满干柴的草垛上，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地决定，在12月9日发动一次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掀起全民族抗日救亡的高潮。会议决定由姚依林和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各路请愿游行队伍于9日上午11时在新华门前集合。

12月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20多所学校代表。会上，将北平学联党团的决定以及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通知了大家。在组织工作上也进行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支队伍在西直门内集合，沿途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学校。彭涛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次行动以请愿开始，请愿不成，即转为示威。会后，代表们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将行动计划带回各自的学校，开始了热烈的准备工作，各校学生纷纷召开会议，落实交通队和纠察队，写标语，做旗帜，印传单，还准备了自卫用的石灰包。真理和正义之火在青年的胸膛里燃烧，北平古城已犹如一座被久久压抑着的地下火山，即将喷射出炽热的岩浆，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将以他们的一腔热血，谱写下中华民族解放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二九 吹起号角 1935年12月9日，饱经忧患，沉默无声的北平古城，象雄师一样怒吼了。

天刚拂晓，城内城外各校参加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的青年学生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按预定计划行动起来了。

北平反动当局事先已经得知了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清晨就下达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街道要冲布置了岗哨和密探，企图破坏学生运动。但是，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却以无比的勇敢和献身精神，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重重阻挠，参加了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

东北大学的队伍毅然冲出了校门，按计划他们应与从西直门进城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队伍会合，然后直奔新华门。可这时传来了西直门被军警关闭，清华、燕京的队伍被阻城外的消息。于是，东北大学的请愿队伍只好单独行动。学生们高举着“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的大旗，四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呼口号，一路冲破军警重重封锁，英勇地向新华门直奔而去。

与此同时，中国大学的队伍逾墙而出，汇同师大女附中的同学赶来了；师范大学，女一中、镜湖中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艺文中学的队伍也赶来了，这些队伍一路上散发传单，高唱救亡歌曲，冲破了军警的包围和阻拦，陆续到达新

华门广场。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广场的请愿学生达二、三千人。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就在里面的居仁堂办公。几天前，被日寇雇佣的汉奸、地痞、流氓组成的“华北民众自治会”的代表，带着要求“中日提携”、“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的请愿书，来这里向何应钦请愿，守门的军警恭恭敬敬地请他们进去，何应钦笑脸相迎，待若上宾。而今天，新华门却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队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武装军警手持明晃晃的刀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这鲜明的对照，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无比义愤，他们在新华门前的广场上，挥舞旗帜、标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收复东北失地！”

学生们推选出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名代表，前往居仁堂请愿，并拟定了六项要求，当场向群众宣读，一致通过：

-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
-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经过；
-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
-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由于学生们的坚决斗争，到了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

才被迫出来和学生见面。董毓华等人代表请愿学生强烈要求何应钦出来与学生见面，义正辞严地陈述六项请愿要求，并要求他下令军警打开西直门，让清华、燕京的队伍进城参加请愿活动。对于学生们的正义要求，侯成一方面说何应钦不在北平，代表们的要求可由他代为转达，一方面又说在华北成立政治组织，“乃系国家之政策”，“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等等。对于下令打开西直门一事，他支支吾吾地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加以拒绝。侯成的“答复”更加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愤慨。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不打倒卖国贼，就不能救中国！”，表示抗议。侯成只好灰溜溜地缩了回去。

面对这种昏庸腐败的政府，爱国学生群情激昂，义愤填膺，更加看清了当局的丑恶面目，对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请愿可言，学生代表们经过磋商，当即做出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由宋黎担任。当宋黎宣布“游行开始”后，数千人的游行队伍，立刻涌流在西长安街上。

行进中，宣传队不停地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各种宣传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鼓励和支持，甚至奉命前来阻挠学生游行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中，有一些人也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游行队伍在西单牌楼冲过了由上百名军警和大刀队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在西四牌楼冲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当队伍走到辅仁大学时，先派出了交通员与该校联系，刘达

等100多名学生踊跃地加入了游行队伍。当队伍来到北京大学红楼门外时，游行队伍齐声呼喊：“北大，起来！”“不要忘了五四的光荣！”这时，北大学生立即敲钟集合，200多人高举临时用硬纸皮赶制的北大校旗，参加到游行的行列中。行进中，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浩浩荡荡，直向王府井大街进发。但是，当队伍前锋刚刚到达王府井时，一场更加严重的斗争出现了，这里距东交民巷只有几百米远，警察当局以为游行队伍要冲击日本使馆，已经调来了大批军警，手持水龙、大刀、木棍等，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此时，东交民巷一带也有一批日军出动，沿街架起了机关枪。这杀气腾腾的局势并没有吓退爱国学生，队伍步伐整齐，勇敢地冲了上去。这时武装军警打开水龙向游行队伍喷射起来，数九寒冬、朔风凛冽，冰冷的水柱象一把把尖刀似的喷向学生们的脸上、身上，走在队伍前面的学生领队和纠察队员，全被水浇透了。这时，军警又挥舞着皮鞭、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猛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学生们奋力还击，与军警们进行搏斗，一些学生被打伤流着鲜血仍然高呼抗日口号，有的学生被打倒后爬起来继续加入游行队伍。但是，经过20多分钟的混战，游行队伍还是被军警打散了。有20多名学生被逮捕，30多名学生负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在激烈搏斗过的大街上，结了一层冰，晶莹的冰里渗透着爱国学生的斑斑血迹。

队伍被冲散时，暮色已经降临。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游行指挥部决定把一时被冲散的队伍撤回北

京大学三院。在这里，宋黎慷慨激昂地说：亲日派的大刀、皮鞭、水龙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求严惩肇事者！他传达了北平市学联关于从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和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意见。学联的决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这样，爱国学生才高呼口号，返回了各自的学校。

12月9日这一天，有不少中外记者随同游行队伍实地采访。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自始至终伴随着游行队伍的进退，在爱国学生与军警搏斗时，他们和其他记者急忙前去救援。当天晚上，斯诺就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一条长电讯，称北平又发生了一次五四运动。国内的爱国记者也以不同方式，冲破当局的新闻封锁，以巧妙的方式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透露给广大读者。一二九学运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很快传遍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二·一六 万众示威 一二九游行极大地振奋了北平民众的抗日情绪，一个热气腾腾抗日救国的新局面开始出现。爱国学生经过一二九的锻炼和考验，思想觉悟和组织才能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很多同学愤慨地说：“经过了这次请愿，我们认识了统治者简直不是中国人，失去了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以后我们将不再请愿。”“当着他们的爪牙挥舞着大刀，拿着机关枪和步枪对着我们的时候，当着他们的爪牙的皮鞭打在我们身上脸上的时候，我们还敢做依赖政府的迷梦么？不，不能了。”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及时总结经验，研究制定了一二·一六抗日大示威

的行动计划，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学联吸取上次斗争的教训，按计划把全市同学分为四路大军，各路都在总指挥部的统一命令下，用精干力量组织起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和救护队，以保证游行队伍不被打散。

12月16日，北平城又一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清晨，城内的各路大军，按预定方案出动，在各条道路上与军警展开厮拼搏斗，冲向示威大会的会场——天桥广场。在南长街口，队伍遭到了军警的水龙射击。当即有十几个学生冲了过去，夺下水龙，并用来反射军警。军警们被射得狼狈溃退后，又手执大刀、木棍疯狂地反扑过来。但当军警再次端起水龙行凶时，水龙已是有气无力了。原来学生们用小刀把水龙带割开了几个裂口。军警们想用水龙来驱散学生的企图彻底失败了。队伍终于冲过了封锁线。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组成的城外大队，天明时分受阻于西直门，继又被拒之阜成门，再奔到西便门，2000多名愤怒至极的爱国青年齐心协力，用钢铁般的双臂硬是撞开了紧闭的铁门，哗啦啦地涌进城来。

上午11时左右，各路大军会师天桥广场，这时广场上已有一万多学生和两万多市民。当示威游行总指挥部宣布市民大会开始后，顿时，广场上旗帜翻飞，口号震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这时，游行总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由宋黎和其他同学支撑着，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大家呼喊口号。

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八个决议案。大会一致要求：

一、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二、组织民众、工农兵学商共同抗日；

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

四、反对华北自治，到外交大楼及市政府质问地方当局何以卖国？

市民大会结束后，立即由学生和市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长达数里的游行示威队伍，示威队伍共分两列，每列以4人为一排，手挽手臂并臂向前走去。队伍以清华和燕京的先遣队为先导，高举旗帜，两侧随行的是各校纠察队和自行车交通队，显得额外威武有力。队伍行进中，向街道两侧观看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在电线杆上张贴了无数标语。

这次示威游行的人数之多和它所具有的广泛性，为北平10年来所未有，群情的激愤和热烈也是空前的。它继一二九之后，又一次强有力地打破了笼罩着华北和北平的沉郁气氛，给处于惴惴不安中的北平市民，带去了中国不会亡的坚定信念，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深入人心。沿途又有许多市民陆续加入了队伍。当市民们得知学生们从上午到下午，滴水未进粒米未食时，纷纷送来开水、面食，许多贫苦的市民热情地将自己糊口的窝窝头也送给了学生。

当游行队伍来到珠市口时，城外大队的学生也正好赶